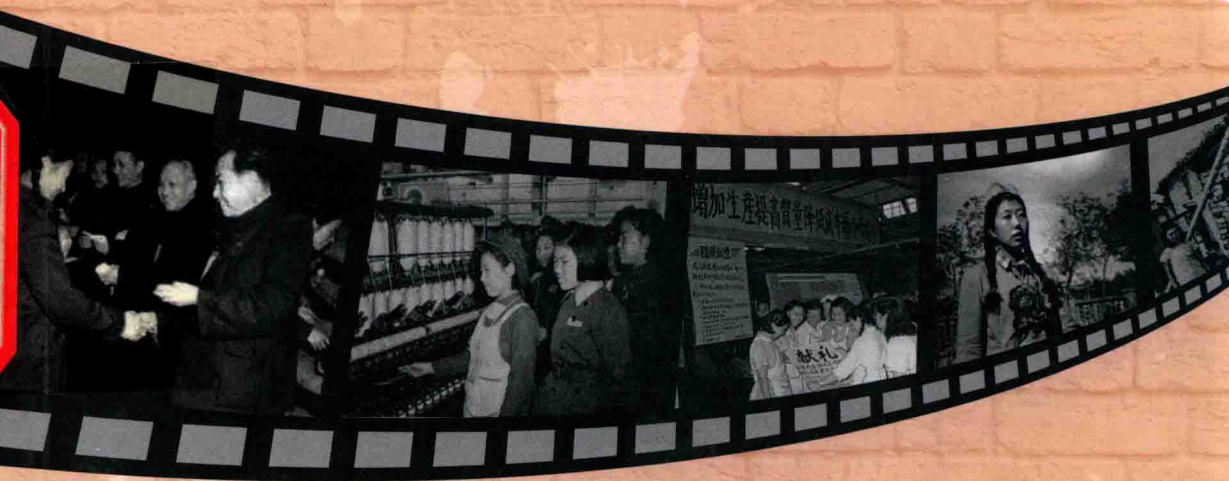


1949-1956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 天津工人研究

梁丽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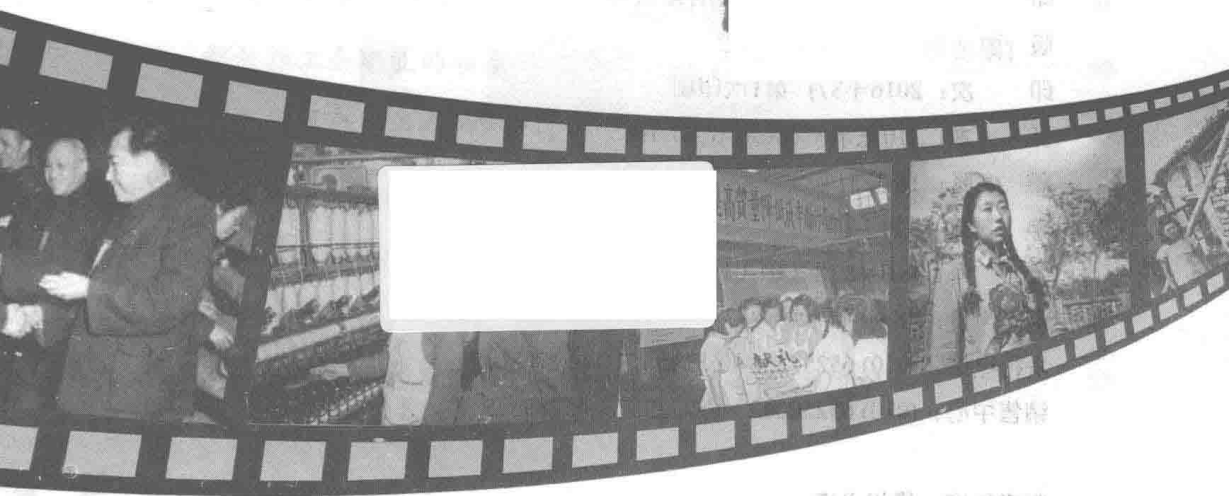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261.3
4
44-1956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 天津工人研究

梁丽辉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

(1949-1956) / 梁丽辉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01-016612-4

I. ①新… II. ①梁… III. ①工人教育—研究—天津—1949—1956 ②工人运动—研究—天津—1949—1956 IV. ①D412.623 ②K2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94294号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 (1949-1956)

XINJIUGENGDIEZHONGDE JUBIAN: XINZHONGGUO CHENGLI CHUQI TIANJIN

GONGREN YANJIU (1949-1956)

总 主 编：梁丽辉

责任编辑：阮宏波 翟金明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6年8月 第1版

印 次：2016年8月 第1次印刷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8.375

字 数：3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6612-4

定 价：48.00元

发行电话：(010) 65257256 65245857 65276861

销售中心：(010) 65250042 65273937 6528953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处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人们的经济地位，宗教信仰，伦理观念，价值取向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人们内心的平衡有一个被破坏和重建的过程，旧时的观念被迫放弃，新的观念在经过内心冲突之后被逐渐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心态的变化必然比平静时期更具彰显的外部征象。这些征象既可能显现在人数众多的冲突事件中，也可能显现于较小范围的人际关系中，还可能显现于个人的日常行为中。通过这些群众和个人的言行，重构已经逝去的历史场景，便会使当时的社会更为清晰地凸现在我们的眼前。^①

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开启了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等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其中以工人为最。工人阶级由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一跃而为“领导阶级”，成为工业发展、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其规模、地位、身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如何展示工人生产生活的变迁呢？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党和政府与工人单向度的“挥手—跟随—效果”三步曲，忽略了工人的主体性，忽略了党和政府遇到的困难、障碍和教训，放大了党和政府的权威与力量，将其神话了。“这种表面上‘高大全’式的称颂实际则贬低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②而以社会史为代表的新史学，则主张通过普通民众的群体和个人言行来重构已逝的历史场景。工人作为底层民众，是有着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心理感受的，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作出相应的行动判断，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行动选择。况且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对新入城的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党和政府每一项方针政策的实施都与工人有一个互动过程，互动的结果可能是国家最终统摄了社会，但这个过程中不能说没有工人的行动，而且工人的行动在很大程

① 王挺之：《社会变动中的群体与个人——新微观史学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度上会影响政策实施的进度与广度。所以本书选取社会史研究视角^①，自下而上，透过民众与地方、国家互动过程中工人的行动选择来展示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真实的生存图景和变迁过程。

天津工人在这场社会变革，或者说在自身变迁过程中的行动选择具有多样性，因目的不同，行动各异。但总体来看，工人的行动选择多从个人利益出发，与国家利益难免相悖，但这种相悖的行动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而仅仅限于个体行动。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天津工人没有集体行动的遗产。天津作为一个北方城市，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天津工人又大多来源于农村，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往往通过血缘或地缘关系结成联盟，或加入有影响的帮会，如青、红帮。天津工人的这种分割，并非如上海工人一样，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潜在基础或摇篮，^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壁垒。所以，解放前天津工人的集体行动，无论其规模还是数量，都远不如上海。可见，天津工人并无集体行动的传统。而且，工人之间的这种分割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并被某些学者看作是工人无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③

二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不具备集体行动的资源。马克思在分析工人的集体行动时指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但却有资源进行集体行动。在这些资源中，重要的一种是阶级意识与工会。^④而对于天津工人而言，两者都不具备。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天津工人一直没有形成基于阶级对立的阶级意识。^⑤解放后的天津工人通过党和政府的外部塑造与内在自觉形成了阶级意识，但这种阶级意识不是劳—资对立的阶级意识，而是一种独特的认同意识——对领导阶级身份、对共产党、

① 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学界说法不一，本书采用赵世瑜的观点，即把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新的视角，新的史学范式，“自下而上”地看历史，从民众的角度重新审视国家和权力。赵世瑜：《理论与实证的交错上升》，见邹兆辰等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

② [美]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页。

③ 如美国学者华尔德。参见其《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龚小夏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④ 参见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⑤ 解放前天津工人没有形成阶级意识，见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239—240.

对国家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同等。这样的阶级意识所产生的阶级行动也就不是对抗而是服从了。至于工会，因其转型，亦使之丧失了组织工人进行集体行动的功能。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不具备集体行动的资源。

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的身份变化成为其集体行动的桎梏。工人由底层民众上升为领导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其社会身份、地位、权力等发生了工人不曾企及的变化。尽管此时期工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成正比，但与解放前的工人以及解放后的农民相比，工人已经位居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工人几乎没有采取对抗的集体行动的理由。

工人无理由采取集体行动，却有理由采取个体行动。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与反思能力，何况工人作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变化最悬殊的一个群体，更有着独特的生活经历与心理感受，他们自然会根据自己的生存经验作出相应的行动判断。就天津工人而言，由于大多来自农村移民，文化水平均不高，所以多数仍具有小农意识，“家”和“个人利益”要远较“国”与“国家利益”为重。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或者说在方针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工人的个体行动，或为了争得物质，或为了争得“面子”，或为了精神享受，多从个人利益出发，与方针政策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企业对工人一切都“包下来”的政策也为工人提供了个体行动的物质基础。而且，随着工人身份地位的提升，其个体行动的权力也越发膨胀。即优待工人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促使工人采取与之相左的行动。而当工人相左的个体行动愈来愈多，积聚到一定数量时，企业、地方乃至国家便不得不变更其方针政策。于是，工人的个体行动取得了集体行动的效果。

1949—1956年，天津工人虽无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大量的非理智的个体行动，如调资升级过程中的逐利行为、生产运动中的歇工旷工行为、学习运动中的不跟队掉队行为等，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个人利益。而且，也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指向——企业或地方政府。也就是说，工人的个体行动虽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但他们在寻求各自利益的时候表达出同样的需求，采用相似的模式，并且目标均指向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各自的行动，当数量变得很大时，便汇聚成了集体行动，即个体行动实际上起到了集体行动的效果。有的学者将工人这种大量的无组织的个体行动称之为“集体无行动”。并将集体行动划分为“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和“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是由

政府发起的，参与者采用正当合理的渠道、遵循行动的规则。这是一种自发的、顺应的反应，并非自觉组织起来的行为。“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指的是公开的游行和违抗。这不是由政府发起的，而是越过了合理的制度渠道来直接挑战政府。^① 1949—1956年的天津工人，无“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却存在大量的“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此时期，天津工人参与了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的“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散布于各个领域，如工人的政治运动、生产运动、学习运动、文艺运动、体育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等。工人的这些集体行动不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而是政府为了快速实现社会变革把工人动员组织起来的。工人的这种集体行动又被称之为群众运动。也就是说，群众运动的方式是变革社会的主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又表明共产党在社会改造过程中践行的是群众路线。

总之，工人的变迁过程是工人与地方、国家的互动过程，变迁过程中工人主体性的行动选择影响了方针政策的实施，从而使整个过程变得艰难与曲折。但恰恰是这种艰难与曲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智慧与成就。

^① Xueguang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8, No. 1 (Feb., 1993), pp. 54—73.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工人的政治生活	17
第一节 工人的政治学习	17
一、工人的政治启蒙学习	19
二、工人的系统政治学习	23
三、工人政治学习的成效	28
第二节 工人的政治运动——以抗美援朝为例	32
一、工人对抗美援朝的态度	34
二、党和政府对工人的宣传动员	38
三、工人对抗美援朝态度的转变	43
第三节 工人的工会组织	46
一、解放前天津工会组织概况	46
二、解放后工会职能的转变	48
三、入会与退会：工人应对工会转型	51
第四节 工人的党团组织	61
一、解放前天津共产党组织发展概况	61
二、解放后天津工厂中党组织的公开	63
三、工人党团组织的发展	65
第二章 工人的生产劳动	71
第一节 工厂的民主改革与管理	71

一、工厂的民主改革	71
二、工人参与工厂管理	74
第二节 工人的日常生产劳动	85
一、劳动条件的改善	85
二、劳动时间的调整	90
三、劳动保护的加强——以女工为例	94
四、劳动纪律的巩固	96
第三节 近乎常态的非常态生产——劳动竞赛	100
一、工人系列劳动竞赛的开展	100
二、工人对劳动竞赛的看法及其转变	107
三、工人劳动竞赛的成效与问题	109
第三章 工人的物质保障	115
第一节 工人的工资	115
一、工人历次工资改革与调整	115
二、工资改革与调整过程中工人的思想及行动	130
三、工资改革与调整的成效与问题	138
第二节 工人的福利待遇	142
一、解放前天津工人的福利概况	143
二、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工人的福利政策	145
三、工人的集体福利设施及困难补助	146
第三节 工人的劳动保险	163
一、解放前天津工人的劳动保险概况	163
二、解放后工人的劳动保险待遇	165
三、工人劳动保险待遇的申请与支付	171
四、工人劳动保险的成效与问题	179

第四章 工人的文体活动	183
第一节 工人的文化学习	183
一、解放前天津工人的文化状况	183
二、工人识字运动的初步开展	185
三、“速成识字法”在工人中的推行、偏差及纠正	187
四、工人识字运动的成效与问题	198
第二节 工人的文艺运动	201
一、解放前天津工人的文艺活动	201
二、共产党“新文艺”——“农民文艺”入津与下厂	203
三、工人文艺运动的开展	205
四、文艺运动中工人的行动选择与政策调适	213
第三节 工人的体育运动	218
一、工人体育运动的开展	218
二、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工人的思想及动——以广播体操为例	221
三、工人体育运动的成效与问题	230
第五章 工人的婚姻家庭	233
第一节 解放前天津工人的婚姻家庭	233
一、婚姻状况	233
二、家庭关系	237
第二节 工人践行婚姻法	239
一、婚姻法的颁布及其主要内容	239
二、自由的困惑与不自由的抗争：婚姻法颁布后工人的行动选择	240
三、角色纠结：婚姻法颁行不畅的原因分析	247
四、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249
第三节 工人新式婚姻家庭的确立	255
一、新式婚姻	255

4 新旧更迭中的巨变：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1949—1956）

二、新式家庭	257
三、新女工	259
第四节 工人婚姻家庭之变革任重而道远	260
一、封建主义婚姻家庭观念仍然存在	260
二、资产阶级恋爱观正在滋长	261
三、工人婚姻家庭变革不彻底之原因	263
结束语	265
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81

绪论

一、选题意义

(一) 理论及学术意义

孟子有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也就是说，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观察历史的重大转变，看研究对象是否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果是，那它就是研究价值极高的问题，从而也就值得历史学者去关注和探讨，^① 从而对历史发展规律与特征有进一步的了解与思考。

1949—1956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这场变革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工人。不知“阶级”为何物的工人由最底层的民众一跃而为“领导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其地位、身份、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人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工人的变化对国家和社会有何影响？工人背后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变迁过程中工人有何心理感受及其行动？工人的心理与行动对其变迁有何影响？等等这些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工人，关注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的变迁。由此还可以透视中国城市社会的变迁过程。而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天津工人的变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1949—1956年天津工人的变迁具有研究价值。

另外，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问题是一个包括党史、党建理论在内的各个学科密切相关的问题”^②，所以，关于工人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关

①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乎党史、党建研究。张静如教授曾呼吁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①，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②，但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尽如人意。所以本书从社会史角度来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党史研究。

总之，“工人阶级”问题，不仅是中共党史，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学术价值。

（二）现实意义

“工人”问题牵涉当今中国诸多方面的重大现实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人的转型问题，这也是对中国的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压力的问题。汤因比曾深刻地说过：“人类的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不去思考甚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在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③ 所以解决当前工人问题就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工人的过去，了解工人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工人的研究可以说正是本着这一目的去做的，希望能为当前工人的转型提供一定的参考。

另外，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明确阐述过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的公私矛盾是客观存在，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两个对抗性阶级的矛盾，所以可以用协商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解决。

通过本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国家政权几乎统摄了工人由公到私的全部生活空间，所以公与私的矛盾可以说无处不在，而党和政府基本上都能够妥善地解决矛盾，没有出现过大的社会动荡，这与当时深入群众、善于做群众工作是分不开的。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如何解决矛盾，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希望本书的研究能够为此提供一些借鉴。

① 张静如：《党史研究重点应转向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1992年第2期。

② 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田汝康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2页。

二、研究现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有关中国工人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并显示出其巨大力量时就已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有关工人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工人研究的著作、资料、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笔者仅就目前视阈所及,分三个时期来对此作简单综述。

1. 新中国成立前工人研究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便开始关注工人,对工人当时的生产状况和阶级意识做过很多研究。^①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中也有许多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如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②、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③ 早期领导人的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发展趋势。

20 世纪 20 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工人,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如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和当时的上海社会局所做的一系列与工人相关的调查等,主要著作有杨西孟的《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④、刘宝衡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⑤、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⑥ 等。陈达 1929 年出版的《中国劳工问题》一书,是中国城市劳动问题研究的最早专著之一。^⑦ 抗战时期,他又写就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一书,“打破了以往劳工调查很少从研究工人本身生活过程出发、因而难以揭示工人生活状况的本质的局面,补救了以往研究生活史的缺陷,并成为研究劳工生活的重要办法之一”^⑧。吴至信 1937 年对十个省 49 个

① 参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第 21 页。李大钊(笔名明明):《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每周评论》1919 年第 12 期。《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8 页。

②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③ 参见《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④ 杨西孟:《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北平社会调查所 1930 年。

⑤ 刘宝衡:《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社会半月刊》1934 年第 1 期。

⑥ 施裕寿等:《山东中兴煤矿工人调查》,社会调查所 1932 年。

⑦ 陈达:《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 1929 年。

⑧ 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565 页。

工矿铁路职工福利事业作了调查。^①之后，伍锐麟对广州市的人力车夫、史国衡对军需工厂工人生活状况也进行了调查。^②这些早期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描述了当时工人的工作时间、环境、工会活动以及工人生活、思想观念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基本上还没有超出纯粹描述的层面，在理论分析上还欠深入。

此时段关于天津工人研究，就工人运动而言，主要有天津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的《天津工人运动史》《五卅运动在天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1919—1949》和王学海的《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工人运动》^③，这些著作和期刊主要记述了建国以前天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政治色彩较浓。就工人的生产生活而言，主要是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天津市社会局等在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如方显廷的《天津地毯工业》《天津针织工业》^④等，吴瓿的《火柴业调查报告》^⑤等，冯华年的《天津手艺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⑥，以及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⑦等。这些调查尤其是林颂和的《塘沽工人调查》记述了天津工人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纪广智的《旧中国时期天津工人状况》^⑧也描述了天津工人在旧中国政治经济上所受的压迫及其斗争。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成果仍处于描述层面，尚缺乏一定的理论分析。

除上述专著外，陈柳青的硕士论文《天津工人经济收入与生活状况考察（1930—1956）》^⑨和王丽丽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天津工厂女工研究》^⑩对天津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对本书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当然，两者作为硕士论文，在资料的搜集，内容的充实方面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① 吴至信：《中国惠工事业》，世界书局1940年。

② 伍锐麟：《广州市六百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出版单行本1938年。史国衡：《昆厂劳工》，商务印书馆1946年。

③ 《天津工人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五卅运动在天津》，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天津工人运动记事：1919—1949》，天津社会科学丛刊第三辑。王学海：《解放战争时期的天津工人运动》，《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1—12页。

④ 方显廷：《天津地毯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出版社1930年、1931年。

⑤ 吴瓿：《火柴业调查报告》，天津市社会局1931年。

⑥ 冯华年：《天津手艺人家庭生活调查之分析》，《经济统计季刊》1932年第3期。

⑦ 林颂和：《塘沽工人调查》，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年。

⑧ 纪广智：《旧中国时期天津工人状况》，《北国春秋》1960年第3期。

⑨ 天津大学，2009年。

⑩ 河北大学，2010年。

2. 建国三十年工人研究

此时期关于计划体制下工人工作、生活、文化意识的研究成果不能说付之阙如,但比较鲜见。最具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袁进的《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①和周雪光的《*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②。

袁进以20世纪50年代为时限,探讨了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上海工人伴随着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动,如何利用集体主义的文化习得,重构新的阶级意识,相应地呈现出崭新的行为动机、精神状态、价值信仰的表象,进一步推动社会机制运行的状况。作者指出,尽管上海工人同全国各地的工人一样,是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随着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被赋予了难以抗拒的身份烙印,但工人阶级自身的话语逻辑和行动逻辑,还是展示了地方性工人文化的特点和活力。但受文化研究视角所限,袁进所利用的主要资料是报纸和期刊,在史学研究方面还有厚重的空间。

周雪光以制度主义解释框架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工人的集体行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制度结构,使大批人的行为方式变得很相似,这种大批(Large Numbers)现象为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当人们想逃避国家的控制而又不敢与之公开对抗时,便采取不顺从行为(如不热心参与由国家发起的政治运动、工作没有积极性、旷工等)来表示抗争。这些行为尽管都是基于个人的行为,但由于是大批人参与,因此,它具有集体的特性,也是一种集体行动。周雪光称之为 Collective Inaction。对于周雪光的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值得商榷,在计划体制下,国家强势,不容置疑,工人与国家对抗的行动可能存在,但这种对抗行动是不是集体行动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专门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其他一些相关研究却不容忽视。

《新中国工人运动史》从传统史学角度出发,以翔实的史料描绘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的光辉业绩。该书对本书研究中国共产党方针政策的

① 袁进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② Xueguang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8, No. 1 (Feb. 1993), pp. 54—73.

实施很有参考价值。^①

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及国企改革前后中国工人变迁的研究，也涉及此时段的工人状况。

佟新的《异化与抗争》，对于此时段的中国女工，她认为，以《婚姻法》肇始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把妇女解放出来，进入到社会生产劳动中去，完成了自我地位的转变，同时“国家以阶级关系来建构工人的工作意义，在工人阶级的话语下，性别意识形态被阶级意识形态所取代”。^②

梅方权的《安源矿工——转型期的变迁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关于我国当前剧烈社会变迁过程中工人状况的社会人类学著作。作者以安源工人为个案，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探讨了工人在企业社区的形成和逐渐解体过程中生产生活的变迁，展现了工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能动性表现。^③

李亚雄以武汉一家老厂为个案，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考察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针对此时期的国营工厂，作者指出：国家主导了劳动关系，劳动者对企业的依赖实质上表现为他对国家的依赖。这种依赖增加了劳动者的反向权力，使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策略。^④

吴清军以东北一家国有企业为个案，探讨了传统产业工人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单位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过程。对于计划体制下的工人，他认为并没有出现劳资雇佣关系中资本—劳动对立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与认同被身份认同以及单位认同所取代。^⑤

另外，关于社会分层（如李强^⑥）、社会流动（如陆学艺^⑦）、工厂办社会（如王延中^⑧）的研究也对本书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再详述。

① 杜万启：《新中国工人运动史》，中国铁道出版社 1991 年。

② 佟新：《异化与抗争——中国女工工作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64 页。

③ 梅方权：《安源矿工——转型期的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

④ 李亚雄：《国有企业制度变迁，从政企合一到分离——以江厂为个案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5 年。

⑤ 吴清军：《国企改革与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07 年。

⑥ 李强：《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第 15 页。

⑦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 53 页。

⑧ 王延中：《中国的工厂和职工生活——工厂办社会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1991 年。